

※「傅柯未刊稿及其研究」專輯※

集體裝備的浮現——研究進度狀態

傅柯* 著 莊浚生** 譯

譯者說明

1. 本篇文章的出處稍微曲折。首先，該文章並非出自於法國國家圖書館下專門存放傅柯手稿的傅柯文庫 (Fonds Foucault)，而是巴黎第八大學哲學系 Kyril Ryjik 教授逝世後，布洛薩 (Alain Brossat) 教授為他盤點文件時所發現。該文章是以油印打字機編寫，而首頁的右上方則手寫註明「傅柯—1974年7月」(Foucault - juillet 74)。其後經過謝瓦列 (Philippe Chevallier) 從多方面進行考證之後，可以基於以下理由推斷出該文章確實出自於傅柯本人筆下：第一，從文章的遣詞用字、詞意表達、陳述觀點的內容與參考資料的引用，與傅柯的著作相互參照下，該文章非常明顯地接近於一九七五年二月出版的《監視與懲罰》(*Surveiller et punir*) 裏第三部分「規訓」(Discipline) 中的第一章〈順從的身體〉(“les corps dociles”) 與第二章〈良好訓練之手段〉(“Les moyens du bon dressement”)。第二，如果只從艾立朋 (Didier Eribon) 所撰寫著名的傅柯哲學傳記裏，尋找傅柯在一九七四年前後之學術研究與政治運動記載的話，很確定地說，其中找不到與該文章的撰寫脈絡相關的證據。但是，如果從《言與

原文“Émergence des équipements collectifs – État d’avancement des travaux”為傅柯的未刊手稿，此文章的出處可參閱譯者說明。

* 傅柯 (Michel Foucault, 1926-1984)，法國二十世紀最著名的哲學家之一，他的思想領域涉及整體的人文科學，其思想的遺產依然在當代法國哲學具有影響力，也同時為政治運動注入豐沛的策略與建言。

** 莊浚生，法國里昂第三大學哲學系博士生。

文》(*Dits et écrits*) 第一二九號與一三〇號文章的出處來看，該文章正補充了傅柯在一九七四年不曾為人知悉的事情。該兩篇文章記錄了傅柯、德勒茲 (Gilles Deleuze)、瓜達里 (Félix Guattari)、霍給 (François Fourquet) 的討論對話，並刊登在一九七三年十二月《研究》(*Recherches*) 中，且以「資本的系譜學 (卷 1)：權力裝備——城市、領土與集體裝備」作為主題¹。在該期刊裏則清楚地表達出本篇文章的撰寫動機與緣由：傅柯從一九七三年六月起曾經在瓜達里所創立的 CERFI 研究中心擔任共同研究計畫的主持人，其中與瓜達里、德勒茲以及該中心的青年學者探究集體裝備、城市規劃與醫療衛生裝備。雖然本篇文章最後並沒有刊登在該主題期刊裏，但從第一二九號文章裏發現，傅柯的發言內容與文章的標題相一致——「集體裝備的浮現」。由此推斷，該文章是傅柯為研究計畫報告當前的進度狀態而撰寫。以上不為人知的共同研究活動，補充了傅柯與德勒茲之間不僅只有政治運動上的合作關係，而且在時空的偶然之間，兩人曾經具有思想交錯的活動。此未刊稿原文與詳細的介紹可以參考謝瓦列所撰寫的導讀：

<https://ici-et-ailleurs.org/contributions/politique-et-subjectivation/article/emergence-des-equipements>。

2. 語詞說明

(1) 裝備 (équipement)

相對於部署 (dispositif) 與機器 (appareil) 而言，「裝備」(équipement) 並不是傅柯的專用詞語。「裝備」在此的意義是指物質體制或系統之對象，例如：學校、軍隊、醫院與公共設施。根據法國著名詞典 *Le Petit Robert*，「裝備」具有針對某確定活動做出裝備某人的行動。「裝備」不只是一種物體對象，而且具有行動的動態意義。因此該詞典的解釋部分地對應了該文章所表達的意義，亦即「裝備」被視為達到規訓目的的工具與手段，也就是規訓技術；針對個人且添加於個人之上的一系列規訓

¹ *Recherches, Généalogie du capital I. Les équipements du pouvoir. Villes, territoires et équipements collectifs* (Paris: Centre d'études, de recherches et de formation institutionnelles, 1973).

活動，例如：「文書身分」、「資格」與「學習檔案」。另外，此文章同時表達了「裝備」的另一意義：治理的目的本身，「裝備」就是執行國家主權與集體治理的對象，接近於傅柯於七十年代起使用「部署」概念的意義。文中所提及的文書書寫為規訓機制 (*mécanisme disciplinaire*) 的研究對象，即是透過不同知識類型的組成與累積，從而達到在治理上的「支配策略的功用」 (*fonction stratégique dominante*) 或「力量關係的策略」 (*stratégies de rapports de force*)。上述兩者皆是「部署」的定義，可參考《言與文》第二〇六號文章。

(2) 浮現 (*émergence*)

根據《言與文》第八十四號文章，「浮現」 (*émergence*)，德文為 *Entstehung*，傅柯亦解釋為「湧現」 (*surgissement*)，該詞的分析強調了產生與見證不同力量的對峙、對立、爭奪與互相支配之狀況。該詞的用法明顯地來自於尼采的系譜學，一九七三年十二月與一九七四年一月兩期《研究》大量地使用了系譜學方法來研究集體裝備。系譜學之所以介入集體裝備的研究，在於批判集體裝備的誕生與來源並不適合以一種功能論的角度詮釋：「誕生不能被還原為功能。」即是不能夠基於物理上的使用而推論出裝備的誕生。使用是人類主觀意志加諸於事物之上，事物的功能及效用並不對稱於事物的本質；同樣地，傅柯對於系譜學的運用並未依循著事物同一性的立場：「事物的誕生，並未保有其起源的同一性，它相斥於其他事物，而且不相稱於事物的起源。」²如同尼采在《道德的系譜學》所說：「『事物』、器官與使用或許只是一系列不斷更新詮釋與適應的歷史，其中的原因並沒有必然的關係，相反地，它們根據不同的情況，純粹地以偶然的方式彼此跟隨與接替。」³因此系譜學具有批判性，批判歷史的詮釋中具有任何起源的宣稱與必然的因果性法則，亦同時透過系譜學的介入展現出集體裝備是具有「使用之外」的秩序。規訓技術不

² Michel Foucault, "Nietzsche, la généalogie, l'histoire," *Dits et écrits*, vol. II, p. 1006.

³ Friedrich Nietzsche, *Œuvre philosophiques complètes VII, Par-delà bien et mal, La généalogie de la morale* (Paris: Gallimard, 1971), p. 269.

僅透過文書書寫行使對「個人」的權力，而且在使用之外與背後，更看到該規訓技術如何重新形塑集體裝備，以及可看到兩者之間的角力關係。

前一回的報告已經指出，前一季的工作⁴致力於研究一個重點：在十七世紀與十八世紀之間某些體制（例如：學校、軍隊與醫院）中的文書系統。挑選該時期是基於以下幾個理由：

1. 我們看到稅收、經濟、司法的龐大記載程序轉入到一種記載個人與其行為的新領域。
2. 透過體制與程序，我們看到一種極為特別的權力型態開始形成，前一時代的政治與宗教控制裏並沒有類似的狀況。
3. 藉此，出現了精緻與詳細的控制機制，使得對於個人的一種知識得以形成與累積。

只要有規訓，就會有一套整齊、細緻、貼近個人和每日生活的檔案；只要有規訓，就會有一套整合瑣碎資料的文件記錄；只要有規訓，就會有一套集中和傳遞資料的管道。規訓將個人放入監視場域內，並同樣將個人安置於書寫的網絡中；規訓把個人束縛在一疊厚重的文件裏，以求捕捉並且固定住個人。規訓體制早已是當作密集記錄與累積文件的場所。無疑地，如同所有行政機關（例如：司法與稅務機關），規訓體制有專屬技術與特定的問題。

這涉及為每個人建立具有特徵、可辨認、約束性與不能撤換的身分；該特殊卻多樣的把握方式並沒有比稅務文書、受洗登記或司法文件更為抽象。將身體、態度、行為、操行登錄進標記與分類的系統中，產生了分類學的問題；並不是為了呈現種類，而是為了辨認出個人的獨特特徵，使個人不可被取代且可被使用。不論哪個自然存在物，要辨認它，就要將它特定化，但不一樣的是，指認一個個人，是為了對個人行使權力。身分指認的問題曾是軍隊的問題：需要尋獲逃兵、避免重覆入伍、修正由軍官所呈上的不實條目、瞭解每位軍人的服役狀況與才能，與建立準確的失蹤及死亡數量清單。身分指認也同時曾經是醫院的問題：需要辨認病患、

⁴ 譯註：前一季應指 1974 年 1 月出版的《研究》，並以「資本的系譜學（卷 2）：歷史的理念」命名，或更早的時間 1973 年 12 月出版的《研究》，並以「權力裝備——城市、地域與集體裝備」命名。因此該文章不僅探究「集體裝備」裏文書檔案的物質現象，在該現象背後隱藏一套規訓機制的支配力量，正是系譜學所探究的地方，同時代表著延續上一季的研究工作。

趕走裝病的人、追蹤疾病的演變、確認藥物的有效性，也要區分出類似的病例及傳染病的源頭。「如果醫師手中沒有備忘本與巡房日誌，指出每個病患的狀態及治療進程，任何擁有優秀記憶能力的醫師都不可能同時管理大量的病人（二十或三十個）……有時候，醫師在前一天看過的病患已經過世，亡故者被移走，但沒有通知醫師；有時候，病患拿不到他該有的藥方，他拒絕用藥或使用了其他病患的處方……另有些時候，病患因為無知或惡意誤導了醫師；其次，還有所謂『悲慘處置』（la malheureuse pratique），把兩個或更多病患一起放在大病床上，任由他們死去」⁵。

身分指認也曾是教育機構的問題，必須指出每位學生的特殊才能、標定他們的程度與能力、指出他們未來可造之處：「入學時，建立了登記本，根據學校的時間與地點，了解孩童的品行，以及他們在虔誠與基督教義的進度、課堂間表現、心智表現與判斷能力。此外，它有助於查看學生被退學、不服從，與壞榜樣學生被淘汰或者被轉校、無故退學與曠課的原因。」⁶總而言之，當時有必要建立一種制定規則的書寫，一套完全個人化的文件記錄。

如此，開始擬定一套物理編碼與一種「體貌特徵」（signalement）。在三十年戰爭（Guerre de Trente Ans）大量徵兵之後，當時強制要求每個部隊將每位士兵的姓名、別名、出生地點與他們的個人特有標記記錄成冊⁷。在十八世紀時，該「標記」（marques）的標示方法逐漸成為法規式的體貌特徵，根據身高、身材、臉型、頭髮顏色或者更稍後的眼睛顏色來標示。描述極為梗概，重要的是，通用的表格取代了當時在司法檔案裏常見的「印象式」（impressionnistes）描述；對身體的法規式、行政的知覺逐漸發展，隨後成為十九世紀體質人類學（anthropologie physique）的基礎。「症狀的編碼」（code des symptômes）同樣地逐漸形成：當醫院的運作讓醫師輪班到不同病床看病時，當醫院的運作使得病房之間或醫院之間（最後，十八世紀下半葉，是地區之間）的病例比較成為可能，乃至可期望時，那就應該發展出一套系統，可以規律地分區控制病理學現象：經驗的溝通、累積與交互參照，都依賴於此系統。基於此，三種進程標誌了十八世紀醫學論述的演變：1. 愈來愈著重用書寫記

⁵ J. du Laurens, *Moyens de rendre les hôpitaux utiles et de perfectionner la médecine* (Paris: 1787), pp. 81-82.

⁶ Jacques de Batencour, *Instruction méthodique pour l'école paroissiale* (Paris: P. Trichard, 1669), p. 64.

⁷ 參見 Corvisier。

載觀察的習慣，甚至是每天的書寫紀錄；2. 精確描述的實踐，貼近於可見現象，愈來愈少投入解釋性理論，而愈來愈專注於最終的知覺分析；3. 最後是詞彙的同質化，這讓知覺內容編制化與普遍化。逐漸逼近醫學檢視，重要性在於關聯到（至少有某部分如此）編碼的必要性以及隨此必要性而來的規訓。

從以上所見，在十七世紀下半葉，醫學出現了看似矛盾的兩種跡象：一是肯定徹底經驗主義的科學價值，文獻只接受觀察的記錄，因此訴諸於嚴格的臨床嚴謹態度；二是頻繁地訴諸於植物學模型，以分類出疾病，當作是固定的、自然的、可辨認的疾病種類，其中有些症狀可以辨讀出典型徵象，就像是林奈的植物分類特徵 (*caractères linnéens des plantes*)。訴諸於植物學模式的疾病診斷，並不只是以概念方式掌握自然界的混亂失序，而且，醫學浮現了邁向正在構建的文書系統，醫院使此文書系統既可能又不可或缺：尋找共通語言、規範身體知覺、構成集體經驗領域。植物疾病的圖像或許是一種偽的可理解性原理；它也是一種對語言的指令。

表現或能力的某種「編碼」(code) 同樣地被沿用於中學與技術學校的教學上。在十七世紀初，拉弗萊什學校 (*Collège de La Flèche*，譯按：現為亨利四世高中) 的老師們根據幾個項目 (聰明程度、出席率、操行、學識範圍) 為每位學生進行簡單的質性考核 (優、劣、中等)，只有幾位教務長能夠知道這些保密的考核資料⁸：學生的考核被封存在教學報告裏。在十八世紀期間，轉變的主軸有四或五個 (編按：原文即如此，保留原句)：1. 試圖建立一些基本範疇，以標示出就學人口的特徵 (十二間軍事學校的學生被分類為四個考核項目：才能體能兼備；有才能但沒有體能；有體能但沒有才能；最後兩者皆無)；2. 試圖量化學生的價值 (橋樑道路學校在一七七四年所制訂的校規建立了等級系統：根據學科、不同教材上的表現、於工地的實習工作、一般出勤狀況，每位學生獲得等比例的等級)⁹；3. 學生之間的排名順序逐漸重要，被當作是衡量學生的方法；4. 制訂出常規、共同、標準考試的排名程序，為獲取資格提供公共行政的特徵。橋樑道路學校從一七七五年起，每年共有十六場考試：三場為數學、三場為建築學、一場為石材工藝學、三場為繪圖、一場為風格、兩場為寫作、一場為草圖起稿、一場為水平測量、一場為建築平面。當

⁸ 參見 Rochemonteix。

⁹ *L'enseignement des sciences au XVIIIe siècle*, pp. 360-362.

得出這些考試的排名後，學生以此作為進入高等課程的資格¹⁰。

以「行為編碼」(codage des conduits)作為範疇分類，仍然停留在非常簡陋的階段，但是，使用程序與資料均質化的方法變得更為嚴格。在一六六九年，巴廷谷(Jacques de Batencour)建議對缺席與不守規矩的學生進行家訪，並對學生的家長提出一系列的問題：到底學生是否服從、有否與兄弟姐妹發生爭執、是否未獲允許就擅自出門、是否貪心或撒謊，最重要的是，「有沒有虔誠地進行早晚禱告」。在十八世紀初，德米亞(Charles Démia)打算給每位探訪者一張有行列劃分的表格：每一行是被家訪學生的姓名，而在每列上則對應著明確的問題：1. 孩子是否對上帝禱告；2. 缺課是否歸咎於他的過錯；3. 是否服從；4. 是否懶惰；5. 是否貪心；6. 是否放縱；7. 有否褻瀆神明；8. 是否愛說謊；9. 與兄弟姐妹有否交惡；10. 是否交上損友，特別是異性；11. 有否粗言穢語。根據正面或負面的答覆，家訪者就畫下一個標記或記下一點¹¹。

形式化的雛形根據傳統範疇、古老實踐的統整運作，具有某種資格化與控制形式的行政調節——這些「編碼」並沒有帶來立即的革新。然而一個重要的程序在此勾勒成形：身體、才能、能力、個人品行開始進入條文規定的程序，這些通通都是文件化形式與權力工具。為了擔保編碼可永久地掌握個人，必須動用的技術是文件的抄寫、集中化、流通、發送。在司法實踐裏，畫押成為一種身體的書寫，透過身體印記直接掌握住個人；藉此方法，主權者用他的符號打印在個人身上，並以此作為工具，辨認個人。

規訓製造出更細緻的控制工具，伴隨著規訓，個人的「檔案」(dossier)技術儘管粗糙，但也已經開始了。該檔案並不是指單一的「案件」(affaire)、交易或犯罪的檔案，而是屬於個人本身的檔案。

如同標記的行政用途，這種流動、轉發、回響、摘要的記錄元素構成了一種細緻、可操作的追蹤方式，而且用處更大；因為當它精確地指涉到獨特的個人身上時，又可以從個人抽離出來，且提供規訓機構作為控制的用途。現實的身體常易於逃避、消失、隱藏、重新出現與改變身分，文件的運作勾勒出一種梗概的又具約束

¹⁰ 同樣的方法，透過學生於共同、開放與常設的會考的排名，外省的軍事學校的學生以此作為入學巴黎軍事學校的標準。

¹¹ 參見 Charles Démia, *Règlement pour les écoles de la ville de Lyon* (Lyon: 1716), pp. 39-40。

性的素描：在其中標出個人有用的特點；然後，將那些特點充當備用與普遍的資料，作為可運用的規則、可定位的圖式與可整合的元素之用途。某種「文書身分」(identité documentaire) 被構成，它基於個人而形成，卻可從個人中分離，又在個人身邊流通且盤桓在個人之上；它看似提供對個人的描述，但事實上是用作控制與利用個人的工具。而它也像是規定，使個人無法逃脫。

以觀察與權力為基礎，什麼是一個個人，所界定的並不是個人的地位與出身，而是這個個人的價值是什麼、可以從中抽出什麼用處、如何藉著他與其他個人的關係而被分類為個人。檔案是從個人提取出規訓身分的基礎；這規訓身分反過來強加在個人身上，當作一種變賣（描述與資格化）；而且，規訓身分充當將來使用的規則。基於「訓練有用的臣民來為國王服務」的理由，軍事學校委員會要求每位學生擁有一個永久開放的檔案，以容許「準確與詳細地瞭解每位學生的個人優點與缺點」。因此，軍團的上尉與中尉被命令要針對他們軍團的學生寫評估表，其中包括詳細說明他們對學生的評價與觀察、判斷學生應該被安排的課程，兼任教師與導師也要針對課程裏學生的學習進度寫評估表；軍事學校的軍官也同樣就軍事操練與指派任務寫出評估表。每個月初匯整這些評估表，以便公告學生的排名。不僅只是建立起個人化的文件機制，而且為了運用在規訓體制裏，這種文件機制的前提是：登記、謄寫、證件流通、大檔案庫構建的一整個物質系統，所有知識集中化與集體化的整個機制，還連帶著其特定的控制效果。身分是在集中化過程中形成且固定，規訓工具所規定的身分具有強制性。無可否認，規訓書寫技術之詳細研究，需要對多種程序進行分析。

首先，要分析的是「隨身文件」(documents d'accompagnement)，它連繫於個人與構成個人身分概覽：在醫院裏，該「小紙片」(petit morceau de papier) 慣常地記錄了病人的姓名，然後用「一段繩子」(morceau de ficelle)¹² 束在紙的底部；如此，可指認身分的紙片被固定在病床邊，或者像聖敘爾比斯收容所(hospice Saint Sulpice) 則採用雙卡制度：「第一張卡是記錄著病人的姓名，第二張則是入院日期；其中一張綁在病床的床腳，另外一張則是繫在病人衣服上。當病人康復或死亡時，該兩張卡的其中一張分送給醫院上級，另外一張則是送到醫師手上，以完成登記註

¹² 論文刊登於 *La délibération du bureau de l'Hôtel-Dieu de Paris* (Paris: 1620)。

明，證實病人到底是已經康復或者死亡。」¹³

另外，我們也可引用勞工的例子，他們像軍人在調職時一樣，隨身攜帶的「離職證明」(congés)或「文件套筒」(cartouches)，直到十九世紀末才普遍化為強制性的「小冊子」(livret)：所有勞工應該擁有該文件，在僱傭時交給僱主，以證明他們以前的職業和調職狀況，裏面往往記錄了前任僱主的意見¹⁴。因此，身體具有其書寫的複本如影隨形：一是在手腕、病床或衣服上，有小文件指出個人身分；二是藉著這些文件，死亡或存活的身體從混亂的多樣性分離出一個可個人化的瞬間，以便全權地控制個人。

同樣地，我們必須研究謄寫與文件流通的模式。每一個規訓構成都有各自的網絡類型、溝通管道、特定分布點，得以累積知識並散布知識，以發放資訊或決策的新動態。在小學這種小型機構裏，該網絡相對地簡單，它圍繞於個人的日常生活行為：缺席、上課不專心或不莊重的學生會馬上地被「評分」(notes)或「記錄」(marqués)，在名冊裏記上優缺點。該名冊在導師手裏，持續更新紀錄；在學校辦公室會議裏，會有一份名冊或清單裏面記載著下列事項：1. 哪些學生最乖巧，與哪些學生進步或退步最多；2. 哪些學生沒有獲得准許就經常缺席，特別是在教義問答課(jour du catéchisme)缺席；3. 哪些學生充分受教而達到離校標準；4. 哪些學生犯下嚴重錯誤，必須到處罰室被糾正。最後，導師「將他寫的紀錄交給秘書，裏面登記了姓名、綽號、年齡與從前一個學校轉來的新生聲明」¹⁵。

在技術學校尤其是軍事機構裏，文件的流程時間更久，因為要以國家的規模來衡量新型態教育的效果，也要核對成績記載的正確性，最終，決定每個學生的職務。當十二間外省的軍事學校創立時，一位督學被任命巡視這些學校；他的工作為撰寫訪學的報告，描述運作成效以及評估管理狀況，最後將報告送回政府。他同時要寫報告，指出某些個別的學生在不同領域的學習狀況（「古典科目」[*objets classiques*]、數學、生活語言、寫作與軍事操練），而且評斷他的品行與性格；最後，他必須追蹤畢業學生的職業生涯，記載他們的就業項目，在哪個機關受聘、是否還繼續為國王服務¹⁶。規訓部署在個人身上編織出愈來愈厚重緊密的書寫網(*unc*

¹³ *Journal de médecine, de chirurgie et de pharmacie* (Paris: 1785).

¹⁴ 在十八世紀時，禁止僱主在勞工的小冊子上留下他們個人的評價。

¹⁵ Démia, p. 14.

¹⁶ Charles De Montzey, *Institutions d'éducation militaire jusqu'en 1789* (Paris: 1866).

trame d'écriture)：這種書寫網讓權力行使和知識形構同時發生，更細緻的權力行使在個人身上，細緻程度直到其存在的毫芒；同時，知識、規則與編碼的形成對個人具有立即的約束效果。

到底增加了什麼手段，使個人資料整合在整體的形態裏？規訓體制發展出一系列的程序，其功能是構成比較與差異評估的範圍，並且還維持著可辨認的獨特性，又能顯露出整體效果、團體聚合、人口分布的現象。規訓檔案同時是集中化與集體化，其模式與技術無疑地被龐大的行政規訓檔案靈活掌握，但為了能夠配合於對個人的細緻控制，這些模式與技術也會被調整與改變。

例如，「基督學校修士會」(les Frères des Écoles Chrétiennes) 使用了集體的大本記分冊。為了「更容易查看學生的出席時間和學習進度」，匯集了每位註冊學生的要點，包括：每位學生名字底下列有入學的日期和在該階段的程度；然後，每一科目列出該學年開學時的評量分數；接著，列出此後每個月的程度，基本考核的優劣分數；最後一列則保留為個別觀察的註記¹⁷。因此，只要檢視大本記分冊，就能同時知道個人目前的程度、最近的變化、從開學以來進度的節奏、學校裏總體學生的平均程度與學習能力的平均速度。且與其他學校比較時，可以知道每位老師的教學效果與學校的品質如何。學童之間哪些特別遲鈍與靈敏的個案，也可得知。透過這些程序得以建構出：1. 學童人口的宏觀控制；2. 教學法的改進；3. 平均現象或偏差現象的標定；4. 藉由知道學童的「自然」(naturelle) 或「正常」(normale) 的演變來證明教學圖式的約束力度。大規模的檔案編製促成了規訓部署，且允許對個人相關特徵的觀察以及集體變因的分析，個人一人口的兩極性定義出對象的範圍。

在規訓文件機制的歷史裏，醫院確實占據著優勢地位。從十七世紀初到十九世紀末之間，醫學文件機制造成巨大的變動，這個變動主要是環繞著醫院檔案的形構，同時屬於行政控制與病理學解讀。在百年間，一整套的醫學書寫被建構，帶著許多有條理的依據：它根據行列交錯表格來劃分出觀察與操作；在十八世紀初期，為了投入科學、經濟、政治上的參與，醫學書寫建構了一組新編碼，它確立了新醫學的可能性條件之一，亦即，畢廈 (Marie François Xavier Bichat) 與臨床醫師的那種醫學。在法國大革命的前夕，醫院的書寫裝備與規章包含下列元素¹⁸：1. 經過值班外

¹⁷ Jean-Baptiste de La Salle, *Conduite des écoles chrétiennes* (1728), pp. 147-149.

¹⁸ 參見 *Les règlements de l'hôpital général et du grand Hôtel Dieu de Lyon* (Paris: 1786), pp. 29-34.

科醫師的初診後，確定收容病人，入院名冊會登錄，在病人手腕會纏上一張紙卡，註明了入院日期、編號、病人姓名和別名；2. 有另外一張紙卡由外科醫師簽名，並要交給醫護人員，隨著病人移交；3. 該文件於翌日將從醫護人員這邊送到總服務處，以便核對是否符合前一天的入院名冊；4. 總服務處必須每天聯絡總務人員，以確認「院內所有存活個人的精準移動」；5. 醫院內的神職人員每天領取入院病人的名單，以「抄寫在祈禱室內的名冊上」。在每個病房內存放著兩本本子，作為「登記藥物、敷料與給病人的處方」用途，其中一本由見習外科醫師所持有，記錄著醫師診斷結果，另外一本則是對第一本的謄抄本；裏面包含著所有先前的處方，在巡病房時醫師拿在手上，以追蹤病情與治療進度。這些本子內分為六個欄位：1. 病床的編號；2. 病人的姓氏；3. 藥物的處方；4. 早晚的用藥；5. 失血量、換藥、外部治療；6. 病人轉院、換病房與證實死亡。醫師在巡查病人後簽名於本子上。然而，在巡查病人的同時，要另外填寫兩份文件：護理師或護理長會在床頭的板子上記錄病人的飲食處方；實習的藥劑師或者藥房的修女在一本本子上寫下藥物處方的指示。在巡房結束後，該本子將會跟外科醫師所持的那本核對，以「避免錯誤」。

在巡房之後，實習外科醫師依序地「在他的部門護理站裏領回用藥規定的表單，以及按照簽名過的表單，分別地處理每一個處方的要求」；同時他要註明「每個病房裏醫囑所吩咐的治療性放血與其他治療，並記錄治療的時間」。這些就構成了醫院中直接的醫學書寫；文件機制逐日地建立起來，完全貼近病人，也貼近對他的照料。整個登錄的系統可以達到量化與比較，於是，也有原始資料的整合過程。醫師必須每個月「開會，以比對他們的經驗，和報告在過去幾週裏看診的基本事實」，以及「撰寫他們的觀察，並將報告呈送到會議辦公室」。為了蒐集每間醫院的個別資料、估量人口分布的病理學現象與確保整體醫療的監督，一八〇一年在巴黎舉行的醫療院所會議，規定了八類文件的使用方式，並規定其精確的處理過程：1. 病房的內部登記本；2. 入院辦公室的登記本；3. 每星期呈送到醫院中央辦公室的表單；4. 出院病人的表單；5. 逝世病人的表單；6. 由中央辦公室所許可的分流登記本；7. 由每間醫院的中央辦公室所持有的登記本；8. 巴黎公立收容所與醫院裏人口流動的登記本¹⁹。規訓的醫院不再是「等待死亡的地方」，反而是觀察、計算、估量、治療、實驗、教學的機器，伴隨著醫療活動，不斷地生產一種無邊的文書網

¹⁹ 註解缺空（原文有註碼但無註解）。

絡，與它的日常運作合為一體。

整個醫學實踐處在一個龐大的記載程序中，以兩極化的文件來建構醫學知識，一極是臨床的與完全屬於個人的；另一極則是集體的，使人口規模上可控制的現象浮現——臨床醫學與統計病理學都根據文書程序而演變。其實，書寫與知識之間的關係有大幅度的改變，類似於奠定自然科學時所伴隨的「去文本化作用」(détexualisation)：必須被認識、引用、評論的書寫—文本(l'écriture-texte)以及有名的經典著作(l'écriture œuvre du maître)若非被取代，就是大規模地被書寫—標記(l'écriture-notation)，以及被可構成、累積、不斷確證知識之登記書寫(l'écriture enregistrement)所抹除。醫院這個龐大的文件機器，很快地將為醫學的科學改造建構出技術基底。在知識的層面上，這種轉變已經被醫師預想到，因為醫師不再有能預見科學發展的規模，而是在醫院的行政組織中、在文書技術的整理中，解讀出可能性。聽聽勞倫斯(André du Laurens)在一七六五年的信件裏怎麼說，他為自己所發明的「表格」系統感到自豪：「看到那麼多有用的人不幸離世，我感到強烈的悲痛，他們原本可以輕易治癒的；又考慮到我沒什麼大用處，還好最終我構想出表格計畫……我向你確保，只有這樣的方式才可以讓醫院運作順利，以及使醫院最有秩序與最準確。事實上，醫師必須為他的行為負責，但當我們有權利要求他做出說明時，到底他在擔憂什麼？我們不能預設他是絕對可靠……除了透過提交病人的狀況說明，以及獲得證明方法以預防惡意隱瞞不知情的病人，並解釋醫師的治療技術，讓別人明瞭之外，是否還有其他方式可以讓醫師充分免責？難道在世界一隅之地為整體人類服務，給予與接受有用的忠告，讓醫學更趨於完美，不就是醫師討人喜歡的地方嗎？用表單來比對日誌，醫院取代了古代神殿，醫師的作為就像神的公僕更新了神諭。我隱約可見一些不稱職醫師對此機構的不滿，他們養成一些陋習：著迷於聲譽多於能力、精於以美化的語詞修飾他們的經驗、只因循於固定的慣例；難道他們恐懼於這些表單會拆穿他們的真面目，只像常人一般，不像個醫師嗎？但是，普遍的福祉與人權〔不屬於〕(譯按：原文缺字)科學嗎？……」²⁰

有兩種程序大致上是同時性，表面上卻是逆反的，或許應將這兩種合併來看：一個是識字程度，在十八世紀時，增加了許多有能力書寫的人；另一則是部署的形成，使個人進入登記的不間斷程序裏。教導書寫，同時被書寫所厚植能力。建造學

²⁰ *Lettre de du Laurens à Poissonnier*, 5 novembre 1765; 參見 du Laurens, pp. 91-94。

校使個人主體可以掌握實踐，又使用實踐來組織諸種服從系統。因此，書寫的擴張具有雙重角色：一方面為能力的增長，另一方面為控制的加重。然而，這兩種過程之間並不是逆反的關係，反而是相互聯繫與依靠：多重的控制行動大部分地加強了（本來就已大量的）對個人識字的需要。相反地，就學造成的等級劃分被大量地使用在規訓體制中：一旦懂得書寫，也就能被監視、也知悉命令、記錄命令、給下命令；書寫的嫻熟度產生一種資格，它標誌著等級的門檻。很早以來，軍隊的低階軍官就經常是從懂寫字、能管理記錄、寫簡單報告的士兵中挑選出來²¹。在貝坦柯特 (Augustin Bétancourt) 或者德米亞 (Charles Démia) 寫的共學基本綱要裏，我們發現，書寫的才能與服從權力的行使已經彼此搭配：那些懂得維護記錄簿、能夠對他人品行記下評語的人，事實上亦取得管控他人的權力²²。在一七八九至一七九〇年度的慈善工場 (ateliers de charité) 記載裏，雖然書寫並不確定是否成為底層舍監的要求條件，但書寫確實造成階層化，並且被委付權力。在書寫之外，還要加上一整個文件網絡：從基層開始，接著匯聚集中，然後，朝向階級金字塔之最上層；記載與謄寫的技術將知識保留給那些手持權力的人；技術從順服的個人身上提取知識，讓個人成為對象，成為分析場域，成為在資訊系統裏可觀察、描述、編碼的元素。另外，技術也不斷地鞏固權力，因為，在以技術為中心，累積有用的檔案時，做決策的官僚能夠使被規訓的個人成為牽線木偶——既有完美的服從，又有知識的尺度，這知識建立在個人身上，也在個人之上。

如同舒文堡 (Schauenburg)²³ 所曾說：「軍隊長官認為，只有士兵服從時，才能夠操縱，因為他完全投入學習認識與投入長官指派的任務。」某些人透過文件程序而被對象化，這才使其他人的權力得以行使，或相反地，行使權力的人掌握「剩餘知識」(plus-de-savoir)，使他取得權力的資格，愈能擔保那些文件對象的服從。規訓書寫扮演著交換者的角色；在不對稱的關係裏，書寫受對象化與服從的交錯程序所管轄：一種超權力 (sur-pouvoir) 與一種超知識 (sur-savoir) 恆常地互相轉換。

²¹ Sieur du Praissac 在《論軍事》(Les discours militaires) 一書中已經強調說：「中士必須懂得閱讀、書寫與計算。」(Paris: 1614), p. 135。另外參見 Jean-Jacques de Beausobre, *Commentaires sur la défense des places d'Éneas le Tacticien, le plus ancien des auteurs militaires avec quelques notes* (Amsterdam: Chez Pissot, 1757), vol. 2, p. 298。

²² 註解缺空（原文有註碼但無註解）。

²³ 譯註：該原名為 Alexis Balthazar Henri Schauenburg (1748-1831)。

一般而言，在十八世紀的規訓部署裏，書寫的使用引起了重要的現象：個人在文件形式上的對象化 (*objectivation documentaire de l'individu*)。或許有人會說，根本不必等那麼久，稅制與司法行政長久以來早就在執行這種對象化。但是，什麼才是真正專屬的規訓技術？那是用書寫程序來提供掌控個人的工具，不是把個人當作法權主體、財產擁有者、罪犯、特權或財富的支配者。相反地，個人被當作某種持有者，持有虛擬的內在特質、才能、力量、疾病、技能、竅門。規訓使得有資格的個人同時呈現為知識的對象與控制的目標；且該資格的定義並非按照個人的出身與社會地位，而是按照我們可藉由資格所獲得的東西，按照不同的用處，按照可將資格加以整合與運用的一些系列。規訓書寫使個人服從於常設的身分指認程序，這種指認程序不同於人口分布的行政統計或實際經濟帳目；但這個程序也不同於博物學家對各種生物所做的物種分類。身分指認程序把每個人釘上特徵化的專屬身分，並按照這一獨特性，整併入文書機制中，產生出一份資料，可讓人描述與掌握，個人自身則無法逃脫這一掌握。

資格化的日常個人被登錄在一套細緻的書寫實踐中與一套常規的檔案系統中，這種登錄帶來兩種轉變。

第一，「案例」(*cas*)的分析以及書寫在個案上所扮演的角色。在「良心案例」(*cas de conscience*)的基督教修行裏，能納入書寫檔案的只有：決斷的規則、參照文本、理想圖式與情勢上典型的例子。即使在現實裏提供獨特的參照，被謄寫的「案例」也只能是為了將來應用的分析框架；事情本身以及其主要角色與情節變化，都只停留在口說的層次。相反地，當個人被細心地指認、每天觀察其獨特存在，或者被以某些符碼來代替時，規訓開始細緻地建造一整套檔案來納入那些個人。由良心導師 (*directeurs de conscience*) 所留下的檔案通常極為罕見，幾乎是獨特的，這種獨特性的來源有：複雜的假定、附加的許多情勢、多重的矛盾原理；良心案例所記錄的並不是對懺悔者的觀察，反而是對導師所訂下的行為規則。十八世紀組織起來的規訓實踐，所整理的是記載與描述的可能性，例如個人自身的生命、過去與行為所形成的「案例」。而在良心指導裏，「案例」是一種圖式，在有需要的時候，能夠被運用在個人身上與規訓機制 (*mécanisme disciplinaire*) 裏，因而，個人幾乎就是一個可描述與可分析的「案例」。決疑論 (*casuistique*) 的彙編是屬於法學的，但是，規訓記載即使形式非常粗糙，都還帶有個人的一種「臨床」可能性 (*possibilité d'une "clinique"*)，包含醫學、精神治療、心理學、教育學的臨床。

第二，「案例」的知識論顛倒帶來另一種更政治性的轉變。長時間以來，任何的個人性，無論是低微的與一般眾人的，皆達不到被描述的門檻。被觀看、被觀察、被細節刻劃、被不間斷的書寫日積月累地追蹤，這些都曾經是一種特權。人的編年史、其生命故事與順著他的存在軸線所編寫的歷史文獻，這些都是他權力儀式的一部分。然而，規訓過程翻轉了這種關係，降低了描述個人性的門檻，並且用這種描述成為一種控制手段與一種支配方法。文件不再只是為了未來追憶用的紀念碑，反而是為了實際的使用。規訓的框架愈嚴格，新的可描述性就愈明顯：從十八世紀以來，順著規訓機制的傾向，孩童、瘋子、囚犯愈來愈容易成為個人描述與傳記故事的對象；將真實存在化為書寫，這不再是英雄化的過程：書寫的功能是對象化與服從的過程。精神病人或其他犯人的生命被仔細地檢查，就像是國王的編年史與有名強盜的事跡，皆露出書寫的某種政治功能，但又完全不同於權力技術。

十八世紀已經使用了登錄程序，個人化的文件機制還算是非常初步的實踐，還有待建立，這種程序屬於剛開始的階段。但經過幾十年之後，開始演變出一種技術，那是描述、傳記、日常觀察的病歷、審訊、挑動故事 (*récit provoqué*) 的技術。在人文科學的歷史裏，這種書寫技術更早被精神醫學與犯罪學所使用，比費希納腳規 (*compas de Fechner*)、心理電流反射 (*réflexe psychogalvanique*)、退化感情概念 (*notion de régression*) 與催眠治療 (*pratique de l'hypnose*) 更為重要。無論如何，我們不能夠扭轉事物的秩序。從某個時刻起，我們能夠在人的過去與其整體的生命裏，尋找他們犯罪的理由或理解他們為何而瘋狂。司法與行政機關提出一些枯燥乏味的問題：你是誰？什麼是屬於你的權利？什麼是你的財產或者你所犯下的罪行？再加上好奇的問題：你是哪一類的人？你有什麼樣的過去？你的家人和你周遭的人是誰？你如何生活？什麼是你的人生大事？但這些提問並不是因為在預設與理論假說上已經承認可以從中找到可理解的原理。最重要的是，因為觀察、記載、控制的技術早已建立一種可能的知識領域，這種知識是針對人的存在，或者至少針對規訓機制所可察覺的特徵。

